

鄭觀應《易言》在朝鮮朝末期的譯介研究

王长江*

1. 鄭觀應與《易言》의 出版
2. 《易言》在朝鮮의 流傳及其在韓國의 收藏現況
3. 從漢文本《易言》到韓譯本《이언易言》
4. 結語

〈국문초록〉

1862년, 鄭觀應은 《救時揭要》(1873)를 저술하기 시작하였다. 1880년, 5년 동안에 걸쳐 《救時揭要》발표문에 대한 수정 보완과정을 거친 후, 鄭觀應의 “中學爲體, 西學爲用” 思想을 기술한 《易言》이 간행되었다. 중국 근대의 유명한 洋務運動家 王韜는 일찍이 이 책의 서문과 발문을 써서 《易言》의 특징과 우수성을 높이 평가하였다. 1880년10월, 朝鮮의 修信使 金弘集은 일본을 방문하고 귀국할 때 《易言》을 가지고 돌아와 高宗에게 상주하였는데, 이 책은 정부와 민간에 큰 파문을 일으켰고, 1883년, 朝鮮 司譯院에서 漢文本 《易言》을 再刊하는 한 편, 순한글본 《이언易言》을 동시에 번역하여 전국의 八道 官署에 나누어 주었다. 조선에서 진행된 《易言》의 재간과 번역은 중국 근대의 洋務思想이 조선의 開化期思想에 상당한 영향을 미쳤다는 사실을 입증한 사례라 하겠다. 《이언 易言》의 번역 특징은 中世 朝鮮의 諺解 直譯習慣을 보완해 줄 뿐만 아니라 처음으로 조선에 들어온 서양의 새 단어에 대해 합리적인 해석과 번역을 시도한 것으로 각별한 역사적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

* 中國 河南工程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講師

핵심어 : 鄭觀應, 朝鮮再刊本《易言》, 순한글역본《이언易言》, 司譯院, 개
회사상, 中韓翻譯

1. 鄭觀應與《易言》的出版

鄭觀應(1842-1921), 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 雍陌鄉。本名官應, 又名觀應, 字正翔, 號陶齋, 別號杞憂生, 中年以後別名羅浮侍鶴山人¹⁾。中國晚清著名啟蒙思想家、政論家、實業家、教育家。他一生的商業成就在晚清屈指可數, 同時又有大量著述出版, 如《救時揭要》、《易言》、《因果集證》、《陶齋志果》、《盛世危言》、《羅浮侍鶴山人詩草》等。華東師範大學學者夏東元先生曾在《鄭觀應年譜長編》中稱其為“學商”。有關鄭觀應生平思想的論述, 夏東元已經在〈鄭觀應思想發展論〉(《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中做了詳細的論述。本節不作贅述, 僅在前人基礎之上就本文主題《易言》(1880年版)成書之前的鄭氏主要人生經歷做簡單概述, 以便讀者理解鄭觀應創作《易言》的個人背景淵源。

1847年, 鄭觀應六歲。是年開始“進入‘少攻儒業, 授徒自給’的父親鄭文瑞開設的秀峰家塾開蒙。1855年前後, 十四歲的鄭觀應隨親朋到南洋(東南亞)一帶遊歷。這次遊歷開闊了鄭氏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洋務思想基礎。1858年, 十七歲的鄭觀應“在香山應童子試, 未中, 乃奉父命到上海學賈。到上海後, 寓居於時任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秀山)處, 在那裏做些工役事, 並跟秀山學英語。鄭觀應在講這段歷史時說: “昔官應年十七, 小試不售, 即奉嚴命赴滬學賈。從家叔秀山學英語。2)”

1) 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2009: 頁1)。

1860年，十九歲，進入上海寶順洋行，被派管“絲樓”兼管輪船攬載事務，自此開始買辦³⁾生涯。鄭觀應在洋行工作，除去營生外，還另有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以挽利權，慾塞漏卮。⁴⁾”1863年，二十二歲，開始構思寫作《救時揭要》⁵⁾一書。該書於1873年出版，隨後經過增刪，成為後來的《易言》。1866年，在寶順洋行工作後期，鄭觀應曾從英華書館⁶⁾的傅蘭雅⁷⁾(John Fryer, 1839-1928)讀

-
- 2) 〈複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盛世危言後編》，見《鄭觀應集》，轉引自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2009：頁17)。
 - 3) 買辦，亦稱“康白度”(葡文comprador的音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替外國資本家在本國市場上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原指歐洲人在雇用的當地管家。在中國，指外國資本家在舊史國設立的商行、公司、銀行等所僱用的史國經理。“買辦”一詞，明代專指對宮廷供應用品的商人；清初專指為居住廣東商館的外商服務的中國公行的採買人或管事人。鴉片戰爭後，廢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選當地中國商人代理買賣，沿稱買辦。其性質既是外商的雇員，也是獨立商人。嗣後，外商為了減少買辦的中間佣金，逐漸採取與華人直接交易的方法，買辦遂轉化為單純的外商雇員，稱“華經理”或“中國理”。參見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99：頁129)。
 - 4) 〈複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盛世危言後編》，見《鄭觀應集》下，頁620。轉引自夏東元編著(2009：頁20)。
 - 5) 《救時揭要》共24篇：反對外國侵略者販賣“豬仔”和奴役的有11篇，論述救災恤貧和慈善事業等有關社會問題的有7篇，宣揚因果報應迷信、勸人為善的有5篇，付印時(1873)臨時加進去論述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1篇。引自夏東元編著(2009：頁28)。
 - 6) 1865年，在英國聖公會支持下創辦的教會學校。在校學生大多是來自廣東、寧波等地的富商子弟和上海的上層社會人士子弟。1866年，有半年時間英華書館設立了夜校，一度有二十個學生就讀。鄭觀應即此時進入該校學習的。參見王紅霞，〈傅蘭雅的西書中譯事業〉，博士論文，2006，頁18～19。
 - 7) 傅蘭雅，1836年8月6日，生於英國肯特郡海斯鎮(Hythe, Kent)。曾就讀於英國倫敦海伯利學院，攻讀師範教育。畢業後響應維多利亞主教的號召，於1861年8月到達香港，就任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Hong Kong)院長。1863年，任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1865年，在上海由聖公會支持創辦英華書館，並教授英文。1866年，編輯《上海新報》Chinese Newspaper。1868年，到江南製造局擔任翻譯和祕書。1875年起，成為籌建中的格致書院(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董事會祕書。1876年，創辦中國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雜誌-《格致彙編》。1885年初，在上海開設“格致書室”，專門出售各種有關科學技術的中文書籍和儀器。1893年起，擔任南洋水師學堂的科學顧問，負責各門科目的考試。傅蘭雅一生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度

英文夜館，“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⁸⁾”。1870年，在安徽捐升郎中。是年，刊印《陶齋志果》一書。該書分四卷，帶有因果報應的迷信成分，但因其主要目的是勸善戒惡、重視人才，因此也有著積極的意義。如鄭觀應在重刊〈陶齋志果·序〉中有言：

“《志果》一書，言非無稽，事皆征實，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竊願懷道德之君子廣為傳播，俾善知勸而惡知懲，則種花得果，左券可操。顧前書之刻，去今十餘稔矣，此十餘稔中，時局蒼狗，變幻萬端，比歲以來，群以高談洋務為通才，機械變詐為能事，幾不知因果為何物。嗚呼！人謂中國之弱在無人才，餘則謂中國未嘗無才，特誤用其才於自私自利，而不顧大局，上下相蒙，此中國所以日弱也。”⁹⁾

上述序言中，鄭觀應痛批了那些空講洋務、心存狡詐、自私自利的行為。認為國家興亡之根本在於人才，而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思想，要有為國家發展顧全大局的開闊眼界。縱觀鄭觀應的一生，他的所行、所言、所著，皆是以道義、國家為重。他本人便可看作是其自我主張的堅定踐行者。1872年，三十一歲，作《救時揭要》序。在序言中講該書內容多為“觸景傷時，略陳利弊”之作。其中多篇是隨著自己的所見所聞，進而訴諸筆端登在當時上海名報《申報》上的作品。1873年，三十二歲，入股輪船招商總局。參與創辦太古洋行輪船公司。3月，《救時揭要》刊行。1875年，三十四歲，《易言》36篇本初稿完成，請王韜¹⁰⁾

過。他熱心於教育和科學翻譯，能夠熟練運用粵語、官話、上海話。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的28年中，他翻譯的書籍涉及數學、物理、化學、礦物學、地學、工程、製造、軍事、農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科，幾乎涵蓋西方近代科學的每一個分支。參見王紅霞(2006：頁1~2)。

8) 東元編著，上揭書，(2009：頁27)。

9) 東元編著，上揭書，(2009：頁45)。

(1828-1897) 爲之作序。鄭觀應亦作〈自序〉。1878年，三十七歲，與徐潤、盛宣懷¹¹⁾(1844-1916) 等人辦義賑公所。除辦晉賑外，復捐資賑濟河南、直隸、陝西等省災荒。寫作〈上海籌賑公所勸募河南、山西義賑公啓〉、〈上海籌賑公所分致各埠義賑書〉等文章，目的是籌集賑災善款，倡導人們捐資賑災救民。除了積極募捐賑災之外，還爲河南災民代贖回因災荒被迫出賣的子女。爲此，鄭觀應特擬定了〈蘇、浙、滬、楊籌賑同人擬代贖災民已賣子女章程〉¹²⁾一文，爲救贖河南被賣婦女建言獻策。鄭觀應這種悲天憫懷、男女平等、尊重婦人的思想在其《易言》36篇本中的〈論裹足〉一篇中亦有體現。1880年，三十九歲，《易言》36篇本由“中華印務總局”刊行。這部書的刊行，代表鄭觀應洋務思想體系初步構建完成。同年，李鴻章委任編修戴恒、龔壽圖等重組上海機器織布局，鄭觀應被劄委會同辦理，並得到“公正廉明，穩練精細，眾望允孚”

10) 王韜(1828 - 1897) 清末政論家。初名利賓，後改名韜，字紫詮，號仲弢，又號天南邈叟、弢園老民。江蘇長洲(今吳縣)人。秀才出身。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曾在上海英國教會所辦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初(咸豐十一年底)回鄉，化名黃曉上書太平軍，被清政府通緝，逃往香港。1867-1870年(同治六至九年)赴英國譯書，並遊歷法、俄等國。1874年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評論時政，宣傳變法。主張設議院、廣貿易、開煤礦、築鐵路、興織織、造輪船、辦學校。1884年經李鴻章默許(光緒十年)回滬居住，主持格致書院。著作有《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等數十種。參見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99：頁1444)。

11) 盛宣懷(1844 - 1916) 江蘇武進人，字杏蓀，號愚齋。1870年(清同治九年)入李鴻章幕。曾督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中國電報局、督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任山東登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起，相繼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兼辦萍鄉煤礦經辦蘆漢鐵路，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創辦中國通商銀行。1900年參與東南互保活動。次年升任會辦商約大臣，向列強出賣鐵路和礦山利權。後創辦天津中西學堂和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任郵傳部右侍郎，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1911年初(宣統二年底)在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任內，與四國銀行團簽訂溯廣鐵路借款合同，激起鐵路風潮。武昌起義爆發，被革職，逃亡日本。1912年返回上海。有《愚齋存稿》及《盛宣懷未刊信稿》等。參見辭海編輯委員會(1999：頁2042)

12) 參見東元編著，上揭書(2009：頁86~88)。

13)的稱許。

《易言》最初的醞釀萌發於庚午(1870)、辛未年(1872)年間，初稿成於1875年，後交由避難香港的王韜作序，鄭觀應亦在當時作了〈自序〉。其後歷經10年的揣摩、增刪，最終於1880年，由中華印務總局刊行。1880年初刊分上、下兩卷，總36篇政論，另有附論2篇。1881年，迫於內陸強大的專制政治壓力，鄭氏懼怕“僭且招尤”，遂邀請沈善登(1830-1902)、謝家福(1847-1896)二人參與，將36篇本刪減為20篇本，在內陸出版。因20篇本的刪減出於被動，因此其思想、情感及語言表達都缺少了36篇本的真摯感和真實度，這也是20篇本未能在社會廣為流傳的原因所在。本文研究對像是傳入朝鮮並被重刊的36篇本，若無特殊情況，下文所述《易言》均指36篇本¹⁴⁾。鄭觀應在《易言·自序》中講到編著該書的原因及書中內容如何得以出版時講到：

“往餘於同治庚午、辛未(1870~1871)間，端居多暇，涉獵簡編，偶有所見，隨筆劄記。內之積感於寸心，外之眷懷於大局。目擊時艱，無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自強之道不外乎此數大端而已。因是宏綱巨目，次第敷陳。自知但舉其略，語焉不詳。積若幹篇存之篋衍，徒自考鏡，未嘗敢以論撰自居。而朋好見輒持去，雜付報館，又闖入近人所刻《聞見錄》中。醜不自匿，嘗用蹴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言已不足重，況言之亦正不易。《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東方朔曰：“談何容易。”是編所存，羞未免易言之戒。顧傳而播者非蒙初心，美芹獻曝，聊竭愚誠而已。達人傑士倘不以其鄙野而教誨之，是則餘之厚幸也夫！”¹⁵⁾

13) 東元編著，上揭書(2009，頁107)。

14) 1979年，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夏東元先生發表論文〈鄭觀應思想發展論〉(夏東元，1979)，該文是中國大陸地區最早提及《易言》兩種版本基本內容的論文。1982年，夏東元先生編輯出版《鄭觀應集》上卷，該書收錄了鄭觀應所著《易言》三十六卷本(1880)及《易言》二十卷本。

《易言》成書之前鄭觀應曾作《救時揭要》(1873)一書。全書共24篇。其中反對外國侵略者販賣“豬仔”和奴役的有11篇；談救災恤貧和辦慈善事業等關於社會問題的7篇；論因果報應、勸人行善的5篇；另有一篇臨時刊印的〈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鄭氏曾在《救時揭要·自序》中講到：“又復觸景傷時，略陳利弊，隨所見聞，頻登《申報》，更伸鄙臆，撰成是編¹⁶⁾”。查1872年《申報》¹⁷⁾，確實登有鄭觀應所作的幾篇文章，如〈澳門窩匪論〉、〈擬遍考醫家以救生命論〉、〈論戒殺放生說〉等，這些文章都為1873年出版的《救時揭要》所收錄¹⁸⁾。而鄭氏又曾自稱《易言》是《救時揭要》的續本。由此可知上文〈自序〉中所講的報館應是《申報》報館。

此外，鄭氏還在〈自序〉中講道：“又闖入近人所刻《聞見錄》中”。筆者推測上文所指《聞見錄》應是丁韋良(1827-1916)創辦的《中西聞見錄》(1872-1875)。查看《中西聞見錄》目錄，果然發現，同治十三年正月(1874年2月)所刊《中西聞見錄》第十九號目錄中有題為〈節《救時揭要》‘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保護商民論’〉的文章。茲將文章節錄如下：

15)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1982：頁63-64)。

16)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上揭書(1982：頁5)。

17) 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刊，過了不到兩個月，鄭觀應就開始在《申報》上發表文章。這段時間，鄭觀應積極主動地向《申報》投稿，引起了《申報》主筆和編輯的關注。到當年11月末《救時揭要》出版時，鄭觀應已先後在《申報》上面發表多篇文章，其中有10篇載入《救時揭要》，分別是：《澳門豬仔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痛亡者無仔論》、《議遍考庸醫以救生命論》、《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保衛商民論》、《記豬仔逃回訴苦略》、《論禁止販人為奴》、《擬自禁鴉片煙論》、《澳門窩匪論》。由於十分關注豬仔問題，鄭觀應在當時被看作是澳門苦力問題的專家。1872年7月，“馬利古士號苦力船事件”爆發，《申報》作了跟蹤報道，10月《申報》連續發表《論皮魯國販人為奴事》、《論禁止販人為奴事》，很多人都將這兩篇文章看作是《申報》約鄭觀應所作的報館評論。參見蔡旭，《鄭觀應新學思想研究》(2014：頁19-20)。

18)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上揭書〈編輯說明〉(1982：頁1)。

“《救時揭要》一書，於去歲刊自上海待鶴齋。意在杜絕販賣人口，禁止吸食鴉片，而旁及他務，均中當時利弊，且與《中西見聞錄》所論者適相符合。茲特節錄一條以廣見聞：〈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保衛商民論〉

嘗思禦眾以慈愛為本，而結下以誠信為歸。宇宙祥和之氣，胥緣一念之惻惻所結而成。蓋愛民如子之心休戚相關。遠近本無歧視，堂廉雖隔，以孔邇聯之。撫卹深情，痍痕在抱，使億萬人為一心，斯能得民矣。昔貞觀朝，使李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故官無曠職，民無怨心，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乃昭其臨禦之誠，愛護之至，保民之道得矣……華官一設，皆不致視外洋為畏途，而出為傭工者必多，則其裨益仍在西人也。西人何不樂從焉。況中朝之留心民瘼乎？況中朝之有心商政者乎？或謂內患未清，兵餉未足，又何餘貨以設海外之官？餘曰：“不然。我中國到外洋者，每人收身價洋一元至二元，如委官衛護，其銀應歸我國收之，儘可敷衍，不須國中之費也。如此則出洋之人得以治生，而又可探聽外洋之禮俗政教，又可熟習外洋之風土民情，一舉兩得。洵可施行，願與有心人一商之。”¹⁹⁾

將上文內容與《救時揭要》相應文章比對，可發現該文完全摘錄自鄭觀應所著《救時揭要》。這就反證了鄭觀應將《易言》視為《救時揭要》續書的真實性。另外，還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資訊，既然上文登載於1874年2月的《中西見聞錄》上，文前所附說明亦有“《救時揭要》一書，於去歲刊自上海待鶴齋。”之言，那麼，這裏的“去歲”便是1873年。再加上，該文雖未直接提出作者姓名，但因鄭觀應經常自號“待鶴山人”，所以可知“待鶴齋”便是鄭觀應私人所辦書館。由此以來，也印證了《救時揭要》是於1873年在上海出版的事實。

前文已經提及，從1870年開始醞釀到1875初稿完成，再到1880年增

19) 《中西見聞錄》第十九號，同治十三年正月(1874年2月)，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22-24)。

添後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刊印出版，《易言》寫作歷時10年。“全書的篇章編排基本上保持了作者寫作時間先後的秩序。《救時揭要》是鄭觀應陸續向《申報》投稿後將文章分類編輯的結果，文章之間缺乏內在的發展線索。但與《救時揭要》不同，《易言》是鄭觀應在設定主題之後才動筆的，它的線索明確，不論是同類題材的篇章還是不同類的題材之間自然貫穿了一條發展線索。²⁰⁾ 該書出版之後，曾流傳至韓、日兩國。鄭氏在其日後著作《增訂盛世危言新編》〈自序〉(1892)中談到《易言》時說：“曾將全作郵寄香港就正王紫詮廣文，不料竟為付梓。旋聞朝鮮、日本亦經重刊。²¹⁾”有關《易言》傳入朝鮮的記錄，朝鮮末期歷史學家黃玹(1855-1910)所著《梅泉野錄》，朝鮮出使日本的修信使李鏞永的《敬窩集略》中均有記錄。鄭官應在其詩集《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收錄了一篇題為〈高麗使臣魚允中、李浣西來購拙著易言並詢治策，書此代柬〉的詩作，也是《易言》傳入朝鮮的歷史記錄。

再來看《易言》的主要內容。全書分上、下兩卷，從《論公法》到《論吏治》十八篇為上卷；從《論邊防》到《論裹足》十八篇為下卷。本兩卷目錄分別如下：

上卷

序(王韜)；自序(鄭觀應)

第1篇：論公法；第2篇：論稅務；第3篇：論鴉片；第4篇：論商務

第5篇：論開礦；第6篇：論火車；第7篇：論電報；第8篇：論開墾

20) 蔡旭，《鄭觀應新學思想研究》(2014：頁24)。

21) 參見鄭觀應著，夏東元編(1982：頁235)。據筆者調查，日本國內現存漢文《易言》版本有3種：一種是1883年朝鮮重刊本；一種是朝鮮手抄本；一種是1895年管斯駿校勘，吳縣管氏可壽齋所刊《管刻易言》。由此可見，日本現存《易言》大多是朝鮮重刊本及1895年中國的後刊本。因此，鄭觀應所謂“日本亦經重刊”的真實性還有待考察。

第9篇：論治旱；第10篇：論機器；第11篇：論船政；第12篇：論鑄銀
第13篇：論郵政；第14篇：論鹽務；第15篇：論遊歷；第16篇：論議政
第17篇：論考試(附)論洋學；第18篇：論吏治

下卷

第19篇：論邊防；第20篇：論交涉；第21篇：論傳教；第22篇：論出使
第23篇：論水師；第24篇：論火器；第25篇：論練兵；第26篇：論民團
第27篇：論治河(附)浙江某君〈專事堤工，似利而有害議〉；
第28篇：論虛費；第29篇：論廉俸；第30篇：論書吏 第31篇：論招工；
第32篇：論醫道；第33篇：論犯人；第34篇：論棲流 第35篇：論借款；
第36篇：論裹足；跋(王韜)；珊溪生注

單看以上目錄，便能看出鄭觀應針對的是整個國家制度的各個層面進行的深入剖析論述。一言以蔽之，革除中國傳統惡習弊政，發展工商業，鼓勵華人對外貿易，借鑒西方整修軍隊，利用《萬國公法》開展同西方列強的平等外交關係，對西方科學技術予以高度評價，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鄭觀應的以上主張雖然體現出明顯的保守性，但這在當時封建傳統為主體的社會意識之下，這樣的思想實屬難能可貴。在當時，還未有一本專著能像《易言》一般提出系統完整的中西並用富國方案。此外，與《救時揭要》相比，《易言》中的論述相對來說更加系統；所表達的洋務愛國思想實現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知的昇華，初步具備了一整套獨特的維新改良思想體系，概括來說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解除內心的“閉關鎖國”心態，承認世界既有之格局，融入世界各國競爭行列。第二，普及國際法認知，利用西方國際法限制西方在中國的種種特權。第三，強化國家對商貿的控制權，抵禦外國資本爭奪本國資本利益。第四，鼓勵學習西方先進工商業理念，發展本國、本民族獨立的工商業體

系，以達到民富國強的理想境地。第五，仿照西方軍事體制，建立完善近代化軍隊邊防體系，抵禦外來侵略。第六，採取西方議院制度，在維護皇權統治的基礎上，實現政治民主化。第七，關心社會民生福利，如裹足、囚犯管理、流民安置等社會問題，期望社會恢復民本主義，朝人性化方向發展。

從1860年到1880年的20年間，鄭觀應從上海寶順洋行的普通買辦，到太古輪船公司的總買辦；從救民賑災，到著書立說；從“學商戰於外人”，到參與民族工業籌辦。未滿四十歲的鄭觀應，以身作則、事實求是地結合晚清時局，在商界和政界走出一條前無古人的“實業救國”之路。為當時的新式企業的紳商們樹立了榜樣。他最可貴的地方在於他不僅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知識，參與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還結合中西之別編著《易言》，集中反映自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想。而擁有此種超前思想的人在當時的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是屈指可數的。這也是《易言》日後流傳朝鮮、日本，並廣受兩國開化人士推崇的原因之所在。清末外交家吳廣霈²²⁾(1855-1919)曾在鄭觀應個人詩集《羅浮侍鶴山人詩草》中為鄭觀應五十歲肖像題詞道：“剛方正直，不合時宜；志在救世，公爾忘私；勇於為善，勞怨弗辭；清廉自矢，中外感知；卓哉此公，知音其誰！”當可看作是對鄭最為公允的評價

22) 吳廣霈(1855—1919)，字劍華，號瀚濤，又號劍華道人、琴溪道士等，涇縣茂林人。清吏部尚書吳芳培玄孫。吳廣霈是清末的外交家，曾以隨員身份先後出使日本、印度、美國、秘魯等地，後任駐漢城總領事、駐日使館參贊，隨行著有《南行日記》、《大東日記》等，其足跡半天下，對當時的世界大勢有清醒的認識。民國後入清史館纂修《清史》，《清史稿》中的外交篇多出其手。吳廣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參與了清末民初的許多重大政治活動，與洋務派代表盛宣懷、鄭觀應交往密切，參與籌建亞細亞協會，參與許多報刊雜誌的策劃發行，參加安徽紳商收回銅官山礦權的鬥爭，孫中山籌劃廣州起義時也曾予以重任，《救時要策萬言書》、《疏防海軍略》等著作正是他憂國憂民心結的明證。他還是一個文物古籍的收藏家和研究者，現存許多文物古籍都烙上了他的印跡，《石鼓文考證》一書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吳小元、童達清，〈清末外交家吳廣霈年譜(一)前言〉，《宣城歷史文化研究》，070期，2019。

2. 《易言》在朝鮮的流傳及其在韓國的收藏現況

朝鮮高宗十七年(1880), 金弘集(1842-1896) 作為修信使代表朝鮮出訪日本。在日本逗留期間, 金氏專程拜訪了清廷駐日大使何如鐘、副使張斯桂和參贊黃遵憲。會面後, 金弘集與清廷這幾位官員的筆談內容現存於《修信史記錄》中。茲選部分內容錄於下文：

黃遵憲曰：“貴國與日本所締條約，僕未見。漢文稿，能飭人鈔惠一分，感謝不已。”

金弘集曰：“謹當如教。僕向請大著《日本雜事詩》，仰重大名久矣。又《日本志》未及見，敢問卷帙可將幾許？”

黃遵憲曰：“今日承雅教，歡慰之極。僕著《日本雜事詩》，近遊戲之心。不知閣下何處見之。然既承青覽，他日過訪，再當敬呈數部乞正。《日本志》，僕與何公(按：何如鐘)同為之。卷帙浩博，可為三十卷，姑未清草。… 中略 …

何如璋曰：“敝張斯桂先生是我國竅通時務之人。今年逾六旬，神明猶如四十許，人亦異稟也。

金弘集曰：“近讀〈萬國公法序文〉，先生蘊抱，早已仰悉。年高德邵，神明益旺，尤可敬也。”

… 中略 …

金弘集曰：“所教切當，閣下大著《使東述略》，敢乞多惠幾布，欲以歸布敝國也。

何如璋曰：“拙著已無存矣，無以副盛意，慚愧。他日再請尊寓，暢談一切也。

從筆談內容可知黃遵憲著有《日本雜事詩》一書；何如璋著有《使東述略》一書；《日本志》(《日本國志》)則是黃遵憲與何如璋共著。而現

今學界只知黃遵憲有《日本國志》、何如鐘有《使東述略》，而不知何氏亦曾參與《日本國志》的編著。另外，筆談中金弘集還透露他已經看過張斯桂所作〈萬國公法序文〉。這說明金弘集那次行程很可能應該帶回了《日本雜事詩》、《萬國公法》和受贈於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只是在筆談中並未言及《易言》一書。但這並不表明《易言》沒有被帶入朝鮮。朝鮮末期歷史學家黃玹(1855-1910)在其所著《梅泉野錄》中有如下記述：

“庚辰(1880)十月，金弘集還自日本，進《易言》二冊。《易言》者清人黃遵憲所著也，大意，處今日而欲致富強，必先學洋制而習洋技。累累數十萬言，大略策士馳騁揣摩之見耳。遵憲攜之遊日本，弘集得之，以備乙覽。蓋欲上之默察天下大勢，而亦原隰諮詢之職耳，非有私意包藏也。拘曲之儒，謂弘集進天主學、攻駁之論，紛然而起。”

上文中，黃玹雖將《易言》作者錯記成黃遵憲，但日期和日本國名倒不至於記錯。黃玹推測金弘集本來想留作自己閱覽，但為了盡到作為臣子應有的忠心，特將《易言》一書獻給高宗，以便高宗瞭解天下大事。不料保守派的儒生們得知金弘集為高宗獻上一部充斥西學的《易言》時，將這本書歸類為西方“天主教”教理書，開始“紛然而起”攻擊金弘集。這樣的結果，或許金弘集也未曾料到。

1881年，朝鮮使臣李鏞永訪日，同樣與仍駐在日本的黃遵憲會面。這次會面臨別之時，黃遵憲特奉上辭別函。最重要的是，李氏從日本外務省大書記官宮本少一那裏獲贈的《易言》、《使東述略》等書。相關記載茲列如下：

① 皮封，承旨李大人，惠收黃遵憲（踏圖書）

拜啓：比聞旌麾，不日首塗，甚為悵戀。閣下此行，勤勞備至，然為國宣勞，

賢者之責，想必歌四牡而不賦北山也。容暇尙當走送，千萬自愛，不宣。

光緒七年七月十日 黃遵憲

② 承旨李公閣下：

《明治史要》一部，《易言》一部，《使東述略》八冊，《日本雜事詩》一部，《海防臆測》一部，右以奉呈。

外務省大書記官宮本小[少]一書”

李氏本次出訪亦獲贈《易言》一部，可見該書在當時頗受韓日兩國政治高層重視。此外，鄭官應在其所著《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亦收錄了《高麗使臣魚允中、李浣西來購拙著《易言》並詢治策，書此代柬》的詩作。通過上述史實的串聯，我們可以發現《易言》在東北亞的傳播是通過民間私教和外交往來的兩種形式，從中國上海出發，以香港作為中轉之地傳至日本，再通過外交活動帶入朝鮮。這種書籍傳播形式反映出19世紀80年代東亞漢籍的傳播還未發展到商業性的大量傳播階段，仍然僅限於權勢階層的小範圍傳播之內。19世紀90年代，東北亞三國民間交流大門的打開，這一現象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易言》被帶到朝鮮後遭到當時保守派的攻擊，並被斥為“天主教”邪術，但仍有不少朝鮮開化思想家顯示出對該書的極大興趣。“1882年，“壬午軍亂”之後，朝鮮高宗下旨向國民征求治國、富國的良方。此令一下，從該年的陰曆七月到十二月為止，共有百餘名官民上疏高宗，其中有近20位的上疏中具有明顯的開化思想。”²³⁾其中，尤以1882年10月7日卞鏊的上疏文提議最為中肯。他建議高宗將《朝鮮策略》、《易言》、《萬國公法》諸書“刊行於四都、八道”，西方學說中“醫農之妙，不害於人道，有益於民產者，可學而效。”對於這樣的上疏，高宗的批示是“省疏具悉。

23) 李光麟著，《韓國開化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81，頁27-28。

所陳切於時務，當留念矣。”或許正是受眾多“上疏文”鼓吹的影響，四個月後朝鮮政府主管下的司譯院主導了《易言》的重刊工作。這一事件在《承政院日記》中亦有記錄：“司譯院啓曰：今番《易言》校刊之役，監印官金載信·崔昌濂·洪漢柱·李鍾健·玄昌運，效勞頗多，並各加一資，何如？傳曰：允。”²⁴⁾

《易言》在朝鮮的重刊得益於統治集團的幕後支持，其核心人物便是朝鮮高宗。歷史上，很多學者評論高宗時認爲其一生爲身邊掌權者左右，形似沒有作爲，沒有報復的傀儡君主。但從黃玹對高宗的評價來看，高宗也曾爲國家富強做出過一定努力。黃玹在《梅泉野錄》中有言：“今上(高宗)銳志富強，紛紛變更，恨羣臣無可仗者。乙酉·丙戌間(1885~1886)，命進《與猶堂集》(丁若鏞著)，慨然有不同時之歎。已而擢其(丁若鏞)曾孫文燮大科，今所定十三府制，亦推演其意也。”由此可見朝鮮高宗曾試圖從實學中尋求國家富強之策，並且依照丁若鏞的理念爲改革科舉、變更全國行政區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另外，“爲了對抗興宣大院君的“斥和政策”，以閔妃爲首的勢道政治集團開始借助《易言》一書所闡釋的開化理論基礎，籌劃新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也是《易言》得以順利重刊甚至翻譯成韓文的重要政治原因之一。

《易言》在韓國的收藏現況，如下[表 1]：

24) 《承政院日記》2910冊，高宗20年3月27日。

[表 1] 漢文本《易言》善本在韓收藏現況表

<p>版本類型</p>	<p>第一類 新鉛活字 本 (中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易言 • 著者：杞憂生 著 • 版形：新鉛活字本 • 刊寫：香港：中華印務總局, 1880 • 形態：線裝2卷2冊：四周雙邊 半郭 18.8 × 12.9 cm, 有界, 半葉10行21字, 上下內向黑魚尾; 27.5 × 15.5 cm • 刊記：光緒庚辰(1880)中華印務總局刊 • 序文：光緒元年(1875)花朝日天南遯老民王韜拜序 • 自序：光緒元年(1875)暮春之初鐵城杞憂生自序海上待鶴齋 • 跋文：光緒六年歲次庚辰(1880)中元節日天南遯叟王韜跋 • 紙質：竹紙 • 現藏位置： 朝鮮國立中央圖書館5樓古文獻室保存書庫：一帙兩冊 朝鮮圓光大學圖書館6樓古文獻室：一帙兩冊 朝鮮成均館大學尊經閣：一帙兩冊 朝鮮忠南大學圖書館5樓古書室：一帙兩冊 朝鮮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古文獻資料室：一帙兩冊 朝鮮延世大學首爾新村校區中央圖書館5樓國學資料室：共四帙, 每帙兩冊
	<p>第二類 木板本 (中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管刻易言 卷上、下 • 著者：杞憂生 著; 管斯駿 校 • 版形：木板本 • 刊寫：中國：管可壽齋, 光緒 12(1886) • 形態：2卷2冊：上下單邊 左右雙邊 半郭 12.5 × 9.2 cm, 有界, 9行20字 註雙行, 大黑口, 上下向黑魚尾, 19.9 × 11.6 cm • 刊記：光緒十二年(1886)八月管可壽齋刊印 • 序文：光緒元年(1875) 王韜 • 自序：光緒元年(1875) 杞憂生 • 校字：吳縣管斯駿秋初氏 • 現藏位置： 朝鮮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4樓古文獻資料室：兩卷一冊 朝鮮首爾大學奎章閣朝鮮學研究院：一帙兩冊

<p>版本類型</p>	<p>第三類 全史字本 (朝鮮)</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易言 • 著者：杞憂生 著 • 版形：全史字本(金屬活字) • 刊寫：中國, 中華印務總局, 1880 • 形態：2卷2冊：四周單邊 半郭 22.7 × 15.5 cm, 有界, 10行21字, 註雙行, 上下向2葉花紋魚尾；32.5 × 20.3 cm • 序文：光緒元年(1875)花朝日天南遯老民王韜拜序 • 自序：光緒元年(1875)暮春之初鐵城杞憂生自序海上待鶴齋 • 跋文：光緒六年歲次庚辰(1880)中元節日天南遯叟王韜跋 • 現藏位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慶熙大學首爾校區中央圖書館漢籍室：兩卷兩冊 朝鮮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4樓古文獻資料室：兩卷兩冊 朝鮮首爾大學奎章閣朝鮮學研究院：共十帙, 每帙兩冊 朝鮮延世大學首爾新村校區中央圖書館5樓國學資料室：共四帙, 每帙兩冊 朝鮮西江大學洛約拉圖書館1館4樓：兩卷兩冊 朝鮮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漢籍室：零本一冊(全上下兩卷) 朝鮮學中央研究院朝鮮學圖書館古書室
	<p>第四類 筆寫本 (朝鮮)</p>	<p>① 朝鮮成均館大學尊經閣藏本(一)</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易言 • 著者：杞憂生 著 • 版形：筆寫本 • 刊寫：朝鮮：[朝鮮朝末期-日帝時代]寫 • 形態：線裝, 不分卷, 1冊, 18行字數不定, 註雙行, 24.5cm(縱) × 21.5cm(橫) • 註記：附：館閣文 • 紙質：楮紙 • 收藏位置：成均館大學尊經閣 <p>② 朝鮮成均館大學尊經閣藏本(二)</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易言 • 著者：杞憂生 著 • 版形：筆寫本 • 刊寫：朝鮮：[朝鮮朝末期]寫 • 形態：線裝, 2卷1冊, 19行字數不定, 註雙行, 22.2cm(縱) × 20.8cm(橫)

版本類型	第四類 筆寫本 (朝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序文：光緒元年(1875)花朝日天南遯窟老民王韜拜序 • 跋文：光緒六年歲次庚辰(1880)中元節日天南遯叟王韜跋 • 收藏位置：成均館大學尊經閣 ③ 朝鮮延世大學首爾新村校區學術情報院藏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標題：易言 • 著者：杞憂生 著 • 版形：筆寫本 • 刊寫：[刊寫地未詳]：[刊寫者未詳]，[刊寫年未詳] • 形態：2卷2冊：無界，10行21字，無魚尾；31 cm • 序文：光緒元年(1875)花朝日天南遯窟老民王韜拜序 • 自序：光緒元年(1875)暮春之初鐵城杞憂生自序 • 跋文：光緒六年歲次庚辰(1880)中元節日天南遯叟王韜跋 • 卷末[記]：天南遯叟雙校 • 分類記號：고서(II) 354.52 5 • 收藏位置：朝鮮延世大學首爾新村校區中央圖書館 5樓國學資料室
------	--------------------	--

經筆者調查，現藏韓國的漢文本《易言》主要有四種版型：第一類，光緒六年(1880) 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所刊新鉛活字本《易言》；第二類，光緒十二年(1886) 八月管可壽齋所刊木板本《管氏易言》；第三類，朝鮮高宗二十年(1883) 司譯院所刊“全史字本”《易言》；第四類，朝鮮末期私人筆寫本《易言》。當世收藏種類之豐，特別是手寫本的傳世更從側面印證了《易言》在朝鮮末期流傳的廣度和深度。

3. 從漢文本《易言》到韓譯本《이언易言》

本節擬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首先，在“韓國歷史學大數據”平台搜索《承政院日記》記錄的司譯院校刊《易言》人員的履歷，考察這些校

刊人員是否曾經擔任漢籍翻譯作業，從而分析漢文本《易言》重刊與《이언易言》的具體聯系。其次，從開化期朝鮮書誌學目錄或同時代個人專著中搜索《이언易言》的書誌信息。期望通過以上探索，解決多年來學界懸而未決的韓譯《이언易言》的出版年代及譯者的問題。

前文提到卞鋈曾向朝鮮高宗上疏，建議將《易言》、《萬國公法》刊行於朝鮮的“四都八道”。高宗硃批“所陳切於時務，當留念矣。”如果按照高宗從閱過卞鋈上疏後便下令重刊《易言》。那麼，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中間大致相隔五個月。但是，簡單的校對重刊工作，並不需要太久；況且又有多達五人參與，又何談“效勞頗多，並各加一資”之理。唯一的可能就是《易言》在司譯院主持下，同時完成了重刊和翻譯的工作。

從《承政院日記》中我們知道參與《易言》出版工作的人員有“金載信、崔昌濂、洪漢柱、李鍾健、玄昌運”五人。那麼，上面五人是不是同時參與了漢文本《易言》的校刊及韓譯本《이언易言》的翻譯工作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搜索上述五人的履歷。筆者在“朝鮮歷史學數據庫”按照五人姓名進行索引，整理出1883年(高宗二十年) 3月27日《易言》校刊完成之前五人與司譯院的相關信息，如下[表 2]：

[表 2] 五位重刊《易言》工作者與司譯院關係表

時間	金載信	崔昌濂	洪漢柱	李鍾健	玄昌運
1881年 6月1日	司譯院啓曰：“…中略… 漢學堂下譯官金載信、李承鈺 …中略… 履歷俱滿，並一體加資，以爲前頭任事之地，何如？傳曰：允。	無	無	無	無
1881年 7月23日	司譯院啓曰：新堂上金載信、李承鈺 …中略… 本院常仕啓下，以爲前頭任使之地，何如？傳曰：允。	無	無	無	無

時間	金載信	崔昌濂	洪漢柱	李鍾健	玄昌運
1882年 11月4日	又以司譯院都提調、提調意啓曰： 《同文考略續編》依原定式開印， 而其編輯之役，刊讐之費， 專使譯官擔當舉行矣。 今於訖役之後， 不可無酬勞之政。校正監印官李應 憲 …中略… 金載信 …中略… 並施加資之典，何如？傳曰：允。	無	無	無	無
1883年 1月22日	司譯院啓曰：《通文館志續編》 依原定式開印，而其編輯之役， 刊讐之費，專使譯官，擔當舉行矣。 今於訖役之後，不可無酬勞之政。 校正漢學堂上玄濟普、吳慶然、 金載信 …中略… 堂下崔昌濂 …中略… 洪漢柱並施加資之典， 何如？傳曰：允。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1883年 2月26日	無	無	無	無	司譯院啓曰： 常仕堂上譯官玄昌運 、李應相， 頗有已紀之勞， 特爲別遞兒堂上差下， 而其陞實次序， 一從元仕先後之地， 何如？傳曰：允。
1883年 3月27日	司譯院啓曰：今番《易言》 校刊之役，監印官金載信、崔昌濂、 洪漢柱、李鍾健、玄昌運，效勞頗多， 並各加一資，何如？傳曰：允。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從上表內容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重要資訊：第一，金載信在五人當中資歷最深，參與書籍編譯的經歷最多；第二，金載信參與了1882年11月4日完成作業的《同文考略續編》編輯工作；第三，金載信爲首的

《易言》校刊組成員都參與了1883年1月22日完成作業的《通文館志續編》的編輯工作；第四，從《通文館志續編》完成作業至《易言》的校刊作業結束，歷時兩個月。第五，參與《易言》校刊的五人都是司譯院的漢譯官，主要承擔漢籍的翻譯編輯工作。

1894年，曾任駐韓法國公使的古恒²⁵⁾(Maurice Courant, 1865 - 1935)在日本出版 *Bibliographie coréenne* (《朝鮮書誌》)一書。該書用法語詳細記載了當時朝鮮出版和收藏的衆多書誌情報。該書357至360頁詳細記載了漢文《易言》及其韓譯本《이언易言》的書誌情報。其中，古恒還記下了一段有關這兩種版本在朝鮮的出版情況：

“조선이 외국에 문호를 개방할 때 조정은 이 저술의 중국판 2冊과 여기서 언급하고 있는 한글번역판을 간행했으며 조정의 배려로 두 가지 모두 京外의 관리와 행정기관에 배포되었다. 이들은 오늘날에는 찾아볼 수 없다.²⁶⁾”

值朝鮮門戶開放之際，朝廷下令將該書(筆者按：《易言》漢文兩冊及該處所述韓譯本(按：四冊)一起刊行；並命令將兩種版本一起分發給京城以外的官員及行政機關。但這兩種書現在已無跡可尋。(筆者譯)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斷定《承政院日記》所錄為校刊《易言》“效勞頗多”的五名漢譯官，於1883年1月22日完成《通文館志續編》的編輯工

25) 古恒，法國東方學家。出生於法國巴黎，畢業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及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主修中文、日文。1889年前往中國任法國駐華使館見習生，1890年任使館翻譯。此後又前往韓國、日本任外交官。1895年後結束外交生涯，赴里昂大學任教。1896年憑借《朝鮮書誌》獲得儒蓮獎。此後又於1903年、1913年、1915年三次獲儒蓮獎。1913年獲博士學位後，成為里昂大學漢學教授。1921年里昂中法大學成立後，出任協會秘書。1935年在里昂逝世。他著有多本東亞研究的書籍，包括*La cour de Pekin*北京朝廷(1891)、*En Chine : mœurs et institutions, hommes et faits*在中國：風俗習慣與制度，人和事(1901)、*Bibliographie coréenne*朝鮮書誌(1894 - 1901)等。

26) 古恒著，李姬載譯，《朝鮮書誌》(1994：頁720)。

作後，又用近兩個月的時間，於1883年3月27日完成了重刊漢文《易言》及翻譯韓譯本《이언易言》的工作。他們分別是金載信、崔昌濂、洪漢柱、李鍾健、玄昌運，他們的名字值得在近代轉換期的漢韓翻譯史上銘記一筆。

《이언易言》的譯介豐富了近代韓語詞彙，尤其為韓語帶來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方新詞彙。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近代韓文的實際面貌。因此，研究《이언易言》這部“朝鮮王朝最後一部諺解本。”²⁷⁾不管從歷史意義，還是譯介學、中韓對照詞彙學上講，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因司譯院翻譯《이언易言》的方法幾乎接近句句對等的直譯，除了個別詞彙的翻譯存在主觀上的刪削外，全書內容基本上不存在刪減增添的部分。為此，下文擬從四個方面重點從語言學的角度對《이언易言》的詞彙譯介²⁸⁾特點作簡單論述，並從句子的翻譯上考察譯本的歸化及異化特征，以展示開化期初期漢韓翻譯的基本面貌。

3.1 專有名詞的譯介特點

本小節選取《易言》“王韜序”、“自序”、“論公法”、“論稅務”、“論鴉片”、“論商務”、“論開礦”中出現的具有西方文化特徵的詞彙，以表格形式對照漢、韓兩書中專有名詞、器物、科學、工商業、政治、宗教等詞彙。對比分析《이언易言》在翻譯這類新詞彙時的翻譯特點以及在翻譯中表現出的韓漢語言、文化特徵。下面先看《이언易言》當中有關專有名詞的翻譯：

27) 閔賢植, 《한글본 易言 연구韓字本易言研究》(2008 : 頁343).

28) 詞彙是構成某種語言的所有語詞和固定詞組的總稱，除一般語詞外，還包括古語、方言、外來詞及特定範圍內的專業術語。完整的文本信息包涵數量眾多的詞彙，其中一些詞彙，如人名、地名、成語及特定時期的專業詞彙，則蘊含著該語言的豐富文化內容。以文本詞彙為單位進行翻譯的研究，能夠從細節上把握譯者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之下進行翻譯，是綜合考察譯者翻譯觀不可或缺的環節。

[表 3] 《이언易言》專有名詞翻譯對照表

類別	《易言》	現代漢語	《이언》	現代韓語	
國家	英境	英國	영길리	영국	
	羅馬	羅馬	라마국	로마 제국	
	英法	英法	영국 법국	영국 프랑스	
	五印度 ²⁹⁾	印度	오인도	인도	
	俄	俄羅斯	아라스	러시아	
	美	美國	미국	미국	
	普	普魯士	보국	프러시아	
	法	法國	법국	프랑스	
	澳	奧地利	오국	오스트리아	
	日	日本	일국	일본	
	印度	印度	인도	인도	
	星加坡	新加坡	성가파	싱가포르	
	巴西	巴西	파셔국	브라질	
	秘魯	秘魯	비로	페루	
地區	西班牙	西班牙	서반아국	스페인	
	依瓜朶耳國	厄瓜多爾	의과타이국	에콰도르	
	委內瑞拉國	委內瑞拉	위셔랍국	베네수엘라	
	臺灣	臺灣	시만	대만/타이완	
	舊金山	舊金山/聖弗朗西斯科	구금산	샌프란시스코	
	澳門	澳門	오문	아오먼/마카오	
	香港	香港	향항	홍콩	
	歐洲	歐洲	구라파 각국 구라파주	유럽주/구주	
	東洋	東亞	동양 제국	동아시아	
	東南洋	東南亞	동남양	동남아시아	
	亞洲	亞洲	아세아	아시아	
	泰西	西方	태서	서양	
	地理	來因河	萊茵河	느인하	라인 강
		多拿江	多瑙河	다라 강	다뉴브 강/도나우 강
米西昔比江		密西西比河	미서척비 강	미시시피 강	
阿彌沈江		亞馬遜河	아마십강	아마존 강	
版圖		版圖	디도	판도	
人稱	華盛頓	華盛頓	화성돈	워싱턴	
	拿破崙	拿破侖	나파룬	나폴레옹	
	洋人	洋人	양인	양인/서양인	
	西人	西方人	서인	서양인	

29) 即印度。古印度區劃分爲東、西、南、北、中五部，故稱之五印度，又稱五天竺。

通過上表可看出,《이언易言》對西方的國家、地區、地理名詞、人稱詞彙的翻譯有兩個特點：

第一,所有專有詞基本上都是按照韓文的漢字音直譯而成。不過也有例外,如:翻譯“英境(英國全境)”時,譯成“영길리”。³⁰⁾第二,涉及國家名翻譯時,於原文國名簡稱不同,韓文的翻譯多附加“국國”字。《易言》漢文涉及國名時多直接書寫國名或用一個字的簡稱代替完整國名,很少在國名後再加“國”字。而韓文在涉及到這些國名的翻譯時,除“아라스”、“비로”外,均附加“국國”字,以明示該詞為國家名。

隨著東西交流的頻繁,進入19世紀90年代末,韓國譯者逐漸從中世紀嚴格按照漢字音直譯專有名詞的束縛中走出,他們認識到從漢字譯音的缺陷,開始直接接觸並融入到以表音語言為代表的語言文化圈中,與漢字音直譯的“諺解”式譯法漸行漸遠。如1897年,大韓帝國學部編輯局主持重刊李提摩太與蔡爾康合譯的《泰西新史攬要》(1895),並在重刊本目錄後增添一段有關人名、地名翻譯的說明,“按:首卷,除序文、凡例、目錄之外,更(更)依原書次序,作〈人·地諸名表〉一篇,凡譯音之與洋音歧異者,考朝鮮國文,胥可得其真矣。”³¹⁾緊接著,學部編輯局又在《〈泰西新史攬要〉人·地諸名表》前針對漢字譯西方人·地名與韓文譯法不同之處詳加解釋如下：

此下國漢文人·地諸名表,蓋因漢字與西字字音迥殊,即如下文第一段(節),“歐羅巴”以我音讀之為“구라파”矣,然而,西洋元音則為유름;又第五段,

30) 在“韓國古典綜合DB”中輸入“영길리”,早在朝鮮正祖17年(1793)已經出現,是漢字“英吉利”的音譯,此處翻譯應視為沿襲傳統翻譯習慣的譯法。下文涉及英國翻譯時,又有“영국”譯法。由此可見,“英國”的稱謂在當時朝鮮的稱呼並未統一。

31) 馬懇西著/李提摩太譯/蔡爾康編,《泰西新史》,漢城:學部編輯局重刊,建陽二年(1897),目錄頁八。

“太平洋”，我音爲“티평양”，而洋音爲“파시윅씨(Pacific)”，以此類推，其相謬誤可知。…中略… 清人所譯而概取西音之相似而已。然我國與清國音節又異，但隨其元本而讀之，即歐羅巴畢竟爲“구라과”、太平洋爲“티평양”、英吉利爲“영길리”而已。茲另作名表以誌。

建陽二年(1897)五月日，學部編輯局增識”³²⁾

從上文有關西方人名、地名譯法的評論看，90年代的譯者已經認識到漢字所譯西方人·地名只是從類似發音的漢字中選擇某些沒有特別含義的漢字拼寫而成，按照這些漢字譯出的詞彙發音與西詞實際發音相去甚遠。因此，他們開始嘗試將韓文表音的特征用於彌補漢字翻譯西方人·地名的不足。這在當時的譯作中有著具體的體現。

3.2 西方新詞的譯介特點

開化期漢韓翻譯與中世紀漢韓翻譯最大的不同在於有關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新詞彙的翻譯。本小節擬從《易言》中選出部分西方新詞彙，再從《이언易言》中選取相應韓文翻譯，考察開化期初期的譯者在翻譯由中介語漢語譯成的西方新詞時所體現的翻譯特點。具體的新詞對照表如下所示：

32) 馬懇西著/李提摩太譯/蔡爾康編，上揭書，(1897：頁一)。

[表 4] 《이언易言》 西方新詞翻譯對照表

類別	《易言》	《이언易言》
商業	郵筒	無
	報館	신문관
	礦務	금은덤
	通商	상로를 통하고.
	洋稅	양국 세전
	洋商	양국 상고
	華商	중원 상고
	呂宋煙	려송연
	洋酒	양국 술
	洋酒店	양국 술을 빚아 슈덤
	鴉片	아편연
	絲茶	면스와 향다
	洋土	양국 토품
	進口之貨稅	포구에 드리오는 물화 세전
	磅	방 [방은 은즈석 량 셔 돈 셔 푼 중이라]
	公司	공스
	總辦	총판 [일을 주장하는 관원이라]
	廠	창[일을 주장하는 집]
	執事	일 보는 여러 사름
工廠	덤집	
理財	직물 다스리는 법	
工業	五金	금은동철
	槍炮器械	양창과 대포의 기계
	開礦	기덤
	煤	미[석탄]
	機器	기긔
	礦夫	역군들
科技	礦師	광스[금은덤 하는 법을 아는 스승이라]51
	電報	던긔선[털스를 느려 소식을 통하는 거시라]
	電綫	던긔선
	格致	격치지학[격물치지학야 궁리하는 학이라]
交通	測算	산학
	輪船	화륜선
	火車	화륜거
	船鈔	선가
	鐵路	털로 50

上表中，涉及西方工商業、科技和交通行業新詞彙的翻譯時，《이언易言》的譯介表現出與固有名詞譯介多用漢字音直譯的不同，明顯具有多樣性和靈活性。例如商業和科技方面便可總結為如下譯介特點：

第一，意譯。如“報館”譯成“新聞館신문관”。

第二，釋譯。如“通商”譯成“貫通商路상로를 통하다”。

第三，漢字音直譯+解釋。如“廠”譯成“창[施工場所]일을 주장하는 집”。

第四，本土語言歸化譯法。如“礦務”譯成“金銀店금은덤”。此處的金銀被視為礦產的代稱。

第五，增譯、增譯+解釋。如“電綫”譯成“電氣綫전기선”；“格致”譯成“格致之學격치지학[格物致知，窮理之學격물치지학야 궁리하는 학이라]”。

此外，對於西方政治和宗教等詞彙的翻譯，《이언易言》的譯者則多採用意譯法。如譯“君主之國”譯成“仁君主管的國家인군이 주장하는 나라”；譯“君民共主之國”為“仁君與百姓一同主管的國家인군과 백성이 함께 주장하는 나라”；譯“傳教者”為“各處行走傳授教法之人교법을 전하러 다니는 자”。這類詞彙之所以採用意譯法，原因在於這些詞彙概念在韓文中並不存在，直譯漢字容易造成讀者的誤讀。而釋譯的語句則以簡單明了地表達闡釋出了原文的含義。

3.3 漢語成語的譯介特點

《이언易言》譯介漢語成語的特點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用釋譯，譯者大多採用韓文固有詞彙直譯成語的字面意思，個中翻譯因未能表示出該成語的引申義，而成了誤譯。如譯“遠慮深謀”為“먼니 념려하고 김히 쇠하다”，其中僅有“念慮념려”一詞是漢字詞，其他皆為韓文固有詞，是字面直譯的特例。再如譯“美芹獻曝”為“아름

다와 세상에 쓰이기를 원하느 비”,將“美芹”中的美拆開後譯成“漂亮 아름다”顯然是誤譯的表現。該成語是原著作者鄭觀應借辛棄疾作《美芹十論》的典故及“美芹之獻”成語合成的四字短語。這樣的誤譯反應出漢字文化圈雖同用漢字但卻存在本質的傳統文化區別。

另一種是採用相近或一樣的漢字音譯成語。漢韓成語一樣或接近的有“一言以蔽之”、“一朝一夕”、“不可會計/不可勝數”、“苦心焦思/勞心焦思”。這些漢韓一致的成語是漢韓兩種語言文化交流的最明顯特徵，是兩種語言融合的結果。而含義相同文字表達上略顯差異的成語，又是語言在不同文化圈內流傳過程中發生變異的體現，同時也反映出漢韓語言表達習慣之間的差異。代表的成語翻譯如下表：

[表 5] 《이언易言》漢語成語翻譯對照表

《易言》	《이언易言》	現代漢語釋意
諱疾忌醫	병을 은휘하고 의원을 쓰리며	隱瞞疾病，不願醫治。 比喻怕人批評而掩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勵精圖治	정신을 가다듬어 다스리기를 도모하시고	振奮精神，想辦法治理好國家。
喁喁然熙熙然	희희호호熙熙皞皞 하야	喁喁：仰望期待；熙熙： 溫和歡樂的樣子
一言以蔽之	일언이폐지一言以蔽之	語出《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意思是“用一句話來概括。”
美芹獻曝	아름다와 세상에 쓰이기를 원하느 비	古人對自己的上書、建議表示自謙，稱“芹獻”或“獻芹”。 辛棄疾曾就宋金交戰作《美芹十論》 獻曝：後比喻人的見識淺陋， 視平常事物為珍奇， 並妄想他人亦會欣賞重視。 用以自謙所獻菲薄，不足當意。

《易言》	《이언易言》	現代漢語釋意
一朝一夕	일조일석一朝一夕	形容很短的時間。
苦心焦思	로심초스勞心焦思	形容爲某事憂心苦思。 現多用(勞心焦思)
怙惡不悛	흉악함을 밋고 허물을 곳치지 아니 하야	堅持作惡，不肯悔改。
開誠布公	성의를 열고 공심을 펴며	坦率誠懇，真心相待。
雨露之化	우로지킵雨露之澤	滋養萬物的雨露之恩澤。 現多用(雨露之恩)
因勢利導	형세를 인 하야 리 하므로 인도 하고	順著事情發展的趨勢， 向有利於實現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導。
不可會計	불가승쉬不可勝數	形容數量極多，難以計數。
遠慮深謀	먼니 넘려 하고 깊히 외 하다	指計劃得很周密，考慮得很長遠。 現多用(深謀遠慮)
以假亂真	그짓 거스로 참 거슬 어즈러이 하야	用假的東西去冒充或混雜真的東西。
返本還原	처음에 식로 나올 석와 고타	返回原來的地方。比喻恢復根本。
喧賓奪主	호빈작주呼賓作主	客人的聲音壓倒了主人的聲音。 比喻外來的或次要的事物占據了原 有的或主要事物的位置。

從語言學史上看，《이언易言》中的翻譯詞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朝鮮末期最後一部“諺解”本中包含的寶貴韓文古詞彙，也為研究開化期韓文新詞彙標記法提供了龐大的語料資源。從詞彙的譯介來看，《이언易言》中多種類型的翻譯特點，是研究開化期早期漢韓翻譯史的寶貴史料。我們能從詞彙翻譯上能看出《이언易言》的翻譯相當嚴謹，誤譯很少，為方便讀者理解起見，譯者還在生疏譯文旁加了注釋。除了詞彙以外，句子的翻譯也接近直譯，意思基本貼近原文，除去誤譯部分，譯文的翻譯絕對忠實原文的內容。這或許與譯介《易言》一事受命於朝廷有關。

由此可見權力對左右譯文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4 句子譯介的特點

《이언易言》句子的翻譯特點是忠實原文，嚴格按照原文的順序和表達進行有序翻譯，譯文的構成多用韓文固有詞彙和語法表達習慣。請看下面引文：

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細流，泰、華不以窮高而辭塊壤。今使天下之大，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騰其說，以待輻輳之采，芻蕘之詢。不必謂言出於誰某，而但問合於時宜與否。應亦盛世所弗禁，大雅所不斥也。往餘於同治庚午、辛未間，端居多暇，涉獵簡編，偶有所見，隨筆劄記。內之積感於寸心，外之眷懷於大局。目擊時艱，無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日：“莫如自強爲先。”³³⁾

강과 바다는 형테 크므로 적은 물을 막지 아니하고, 태산과 화산은 킵이 높흐므로 흙덩이를 스양치 아니하느니. 이제 던하에 크므로 므릇 먹음과 입 잇는 자는 저마다 아는 바를 다하고, 그 말슴을 닐여, 세상의셔 키여 쓰기를 기다리니, 말슴이 닐게서 낫시물 굿뜨여 니르지 말고, 다만 시무에 합당흔 여부만 무를 거시니. 또흔 성세에 금흐지 아니홀 비오, 큰 선비의 물니치지 아니홀 비라. 저즘씩 니 동치 경오 신미년간에 한가히 거하야 걸음이 만키로서 칙을 섭렵하다가 우연이 본 비 이시면 부슬 썩혀 기록하니. 안흐로 심중에 감동하고 밧그로 큰 판국을 료량하야. 시무에 어려운 일을 목도하되, 하슈홀 곳이 업스니, 일언이폐지하고 데일은 스스로 강하게 하느 것만 곳지 못하느니.³⁴⁾

上文的翻譯簡單明了，譯文讀來平易近人，幾乎接近日常口語。利用接近生活的用語翻譯，更容易讓普通百姓理解接受，更能起到開化啓蒙

33) 鄭觀應著，《易言》〈自序〉(1883：頁一)。

34) 鄭觀應著，司譯院譯，《이언易言》〈자서自序〉，高宗二十年(1883)，二張。

的作用。如果說漢文《易言》影響了朝鮮末期的士大夫階層，那麼韓文譯本《이언易言》在流傳的過程中想必可以通過通俗易懂的歸化翻譯而影響朝鮮更廣泛的普通民衆，使得開化之風遍及韓半島全域。翻譯在歷史中的作用怎能忽視？

4. 結語

本文首先介紹了《易言》作者鄭觀應著作該書之前的生平事跡及主要著作，揭示鄭觀應創作該書的社會和個人背景。鄭觀應之所以能夠創作出這部皇皇巨著，與其個人幼年就學私塾，少年遊歷海外，成年出入洋場從事買辦等個人經歷密不可分。加之當時的中國外患頻仍，社會上刮起一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思潮，鄭觀應在愛國心的驅使之下寫下了《易言》一書。此外，還概述了《易言》全書的主要內容。該書並非一時的產物，而是在鄭觀應早期的著作《救時揭要》的基礎上結合其個人在報刊上陸續發表的文章彙編而成。全書核心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融匯中西，使國家重歸富強。第二節，通過史料鉤沉，探究《이언易言》譯介背後的支持者、譯者及時間。經研究可知《이언易言》的翻譯時間是1883年1月至3月間，譯者與重刊者相同，皆為朝鮮司譯院的漢譯官。翻譯作業得以順利完成，全賴於朝鮮高宗統治集團開化派的支持和關照。第三節，從詞彙翻譯的角度探究《이언易言》的譯介特點。從專有名詞的翻譯來看，譯介的特點是依照漢字音直譯而成，且多在國名後附加“국國”字。從西方新詞彙的翻譯看，譯介的特點是採用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方法，因存在東西文化的差異，故譯者更多地會採用意譯的翻譯方法。從漢語成語的翻譯看，譯介分為釋譯和漢字音直譯

兩種形式，反映了韓中兩國同中有異的漢學文化特征。從句子的翻譯看，譯介的特點是忠實原文、語言表達形式貼近本土，表現出明顯的歸化翻譯特點。

《易言》的翻譯在繼承傳統“諺解”直譯的基礎上，語言更顯特徵更多地體現出韓文本土化的傾向。特別是涉及到西學新詞和中國傳統成語的翻譯時，更多地採用韓文固有詞彙意譯或釋譯的方法，避免漢字詞直譯導致的跨文化鴻溝，以便韓國普通民衆理解，從而達到政府通過刊行譯書啓發國民兼備東西以促進國家富強的目的。

▣ 参考文献

- 鄭觀應著,《易言》,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光緒六年(1880);(錄於: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鄭觀應著,《易言》,朝鮮司譯院重刊,高宗二十年(1883),朝鮮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影印版。
- 鄭觀應著,朝鮮司譯院譯,《이언易言》,朝鮮司譯院,高宗二十年(1883),朝鮮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影印版。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黃珪著,《朝鮮史料叢書第一·梅泉野錄》,서울:探求堂,1971。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宋相燾著,《朝鮮史料叢書第二·騎驢隨筆·全》,서울:探求堂,1971。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鄭喬撰輯,《朝鮮史料叢書第五·大韓季年史·下》,서울:探求堂,1971。
- 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史料叢書第十七·大韓帝國官員履歷書》,서울:探求堂,1972。
- 朝鮮歷史學會編,《朝鮮史資料選集(最近世篇)》,서울:一潮閣,1973。
- [韓]董萬吉著,賀劍城等譯,《朝鮮近代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 [法]古恒著,李姬載譯,《朝鮮書誌》,서울:一潮閣,1994。
- 정광、윤세영共著,《司譯院 譯學書 冊板研究》,서울:고려대학교출판부,1998。
- 민현식編著,《한글본 易言 연구》,서울:서울대학교출판부,2008。
- 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 夏東元,《鄭觀應思想發展論》,《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
- 林承豹,〈俞吉濬과 鄭觀應의 政治觀 比較—〈西遊見聞〉과〈易言〉,〈盛世危言〉을 中心으로〉,《弘益史學》3,1986。
- 李光麟,〈開化期 朝鮮人の 아시아連帶論〉,《한국사연구》,Vol. 61·62,1988。
- 李光麟,〈開化思想의 形成과 그 發展〉. 朝鮮사시민강좌, 4, 1989。
- 南權熙,《學部編輯局書冊目錄》考:西洋文物의 流入이 分類體系에 미친 影響》,《社會科學研究》,Vol. 5,1989。

<參考網站>

- 雅丹文庫(아단문고) : [http : //www.adanmungo.org/](http://www.adanmungo.org/)
- 中國歷史文獻總庫網站 : [http : //mg.nlcpres.com/library/publish/default/Login.jsp](http://mg.nlcpres.com/library/publish/default/Login.jsp)
- 朝鮮古典綜合DB : [http : //db.itkc.or.kr/](http://db.itkc.or.kr/)
- 漢典 : [http : //www.zdic.net/](http://www.zdic.net/)
- 朝鮮國立中央圖書館 : [http : //www.nl.go.kr/nl/](http://www.nl.go.kr/nl/)
- 朝鮮古典翻譯院 : [http : //www.itkc.or.kr/](http://www.itkc.or.kr/)
- 奎章閣朝鮮學研究院 : [http : //kyudb.snu.ac.kr/](http://kyudb.snu.ac.kr/)
- 朝鮮史數據庫 : [http : //db.history.go.kr/](http://db.history.go.kr/)
- 朝鮮學資料中心 : [http : //kostma.aks.ac.kr/](http://kostma.aks.ac.kr/)
- 大韓民國新聞아카이브(檔案庫) : [http : //www.nl.go.kr/newspaper/](http://www.nl.go.kr/newspaper/)
- 電子化《承政院日記》 : [http : //sjw.history.go.kr/main.do](http://sjw.history.go.kr/main.do)
- 日本富山大學學術情報庫 : [https : //toyama.repo.nii.ac.jp/](https://toyama.repo.nii.ac.jp/)
-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 [http : //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 朝鮮文學教育網(문학교육사이트) : [http : //www.seelotus.com/frame_g.htm](http://www.seelotus.com/frame_g.htm)
-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漢學索引 : [https : //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 Hathi Trust 美國高校聯合數字圖書館 : [https : //www.hathitrust.org/](https://www.hathitrust.org/)
- 德國國家數字圖書館 : [https : //www.deutsche-digitale-bibliothek.de/](https://www.deutsche-digitale-bibliothek.de/)
-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 [https : //www.nijl.ac.jp/](https://www.nijl.ac.jp/)
-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字圖書館 : [http : //dl.ndl.go.jp/](http://dl.ndl.go.jp/)
- 中國香港大學圖書館 : [https : //lib.hku.hk/](https://lib.hku.hk/)
- 李光麟著,《韓國開化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81,頁27-28。
《承政院日記》2910冊,高宗20年3月27日。

〈Abstract〉

A study on translation of Zheng Guanying's
Yi Yan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Wang, Chang-Jiang

In 1862, Zheng Guany-ing began to write *Jiu Shi Jie Yao* (1873). In 1880, after a five-year supplement and revision of *Jiu Shi Jie Yao*, *Yi Yan* has been published. *Yi Yan* represents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of “Chinese Knowledge as the Body, the Western Learning for Uses”. Wang Tao once wrot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for the book. In October 1880, Kim Hong-jip, the messenger of Joseon visited Japan. When he returned to Joseon, he brought back two Chinese books presented by Huang Zunxian, counsellor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Japan. These two books are called *Joseon strategy* and *Yi Yan*. Kim Hong-jip presented the two books to king of Joseon, which caused a sensation at that time. In 1883, The Joseon Dynasty government Translation Institute (Sa Yaog Wan) reprin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Yi Yan* and translated it into the pure Korean version of *Yi Ohn*, which was distributed to eight regional govern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Yi Yan*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Zheng Guan-ying, a theorist of Westernization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prin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at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are example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westernization thought on the thought of Joseon civilization. The translation features of the pure Korean version *Yi Ohn* not only keep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habit of the medieval proverb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try to make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ern neologisms that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Joseon, it h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Key Words : Zheng Guanying ; *Yi Yan/Yi Ohn* ; Joseon Dynasty
government Translation Institute ;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 Chinese-Korean Translation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